

读书笔记

成功的两个向度

谢青松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成功的向度越来越执著，但是，对于成功的理解却越来越狭隘。人们习惯于根据一个人所拥有的外在之物来判断他是否成功以及成功的程度，而全然忽略了内在精神的向度，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在中国古代智者看来，成功至少有两个向度：外在世界的成功，被称之为“英雄”；内在世界的成功，被称之为“圣贤”。

外在的向度意味着向外寻求，累积外物，建功立业。通常而言，就是占有更多的财富、获取更大的权力，赢得更高的名望、拥有更多的关系。然而，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够获得多少的财富、多大的权力和多高的名望，其决定权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况且，一个人占有越来越多的外在之物，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幸福。一方面，为了获取它们，维护它们，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耗尽相应的生命能量；另一方面，由于财富、权力、名望、关系等外在之物具有不确定性，它们来来去去，人们的心态也随之起伏跌宕，随时惊慌失措、焦虑不安，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宠辱若惊”。中国古代的智者早已发现，财富的规律是“多藏必厚亡”（老子），权力的规律则是“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孟子），名望的规律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而最终，在人生旅程当中所能够得到的东西，都将因某种方式失去，每一个人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如同《红楼梦》结尾中所说的“只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见，外在世界的成功，既伴随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也并非真正的幸福之源。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越来越高的名声，通常给人们带来的并非预期的成功和幸福，而是愈来愈多的孤独、迷茫和痛苦，它提醒我们，向外寻求并非人生唯一的出路。

内在的成功意味着向内探索，求其放心，发现自己。事实上，内在的成功并非是指获得某种他所没有的东西，而是减少或停止向外的追逐，转向内在世界的探索，发现“我固有之”（孟子）的本心本性，回到“吾心之所自有”（杨简）的宁静与和谐。当一个人踏上内在的旅途，有如一个人手中原本死死攥着一块石头，当他发现黄金之后，他会毫不犹豫地扔掉那块石头，转而去抓住黄金，当再看到钻石之后，他会毫不犹豫地扔掉那块黄金，转而去抓住钻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放下的，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所以，一旦找到那个更加重要的、更为宝贵的东西，放下执著，将成为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人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耗费在争权夺利当中，任凭别人留名青史风光无限，却甘心归隐山林与世无争。诸如，汉相张

良辅刘邦平定天下之后，毅然选择了告别权力中心，辞官隐居。东晋诗人陶渊明经历几番出世入世之后，42岁终于辞去官职，归隐山林。他们之所以对功名利禄毫无眷恋之心，甘愿隐居山林，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执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发现了更为宝贵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内心的宁静，比起那些声色货利，显然更加宝贵，更有价值，因此也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他们在事业上看上去“失意”甚至“失败”了，但在另一个向度，他们却是令人羡慕的成功者，生命自有其平衡。庄子在《列御寇》中讲到“舔痔得车”的故事，宋国人曹商出使秦国，得车百辆，回来得意洋洋地向庄子夸耀，于是庄子跟他说：“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瘍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这个典故告诉我们，外在世界的成功，通常是以内在世界的失去所换来的，在智者看来，无异于“以随侯之珠弹干仞之雀”（庄子）。正因如此，事业的高峰，往往伴随着生命的低谷，相反，事业的低谷，往往迎来的是生命的高峰。当然，在最终意义上，既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以他最为恰当的方式度过此生。就此而言，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恰如其分的，并没有好坏之分，更没有成败之别。

那么，如何才能够获得成功？既没有真正的成功与失败，那就不必刻意去追求成功。严格来说，所谓内在的成功，也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罢了，头脑总是习惯于认为，成功需要依靠努力，或者说，是努力让我们获得成功。那么，不妨去观察身边的人，他们是努力，还是被努力？实际的情况是，当一个人处在特定的人生境遇当中，他“不得不”努力，换言之，他“被努力”，但给了他一个“我努力在做这个”，“我努力在做那个”的错觉或幻觉。倘若各方因缘成熟，他偶然“达成了”某个目标，这将进一步增长“我通过努力达成了这个”“我通过努力达成了那个”的错觉或幻觉。更多的情况是事与愿违、目标落空，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本身足以表明事情是自动发生的，成功并非仅仅取决于努力，而是各方因缘聚合之结果，但头脑往往会急急忙忙地加以掩饰：“那是由于我的努力还不够，如果我再努力一些，就有可能会成功。”通常来说，只有等到一个人拼搏到心力交瘁，甚至遍体鳞伤，他才有可能发现，原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都是自动发生的，它并不完全取决于主观意愿和努力程度。此时，他或许会理解到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

正因如此，成功需要的是恰当的努力，而非盲目的努力（瞎折腾）。问题在于，恰恰是盲目的努力，以及想要努力的那个惯性，耗散了我们的生命能量（精气神）。如今，一些人陷入“内卷”的

焦虑当中，甚至为此寝食难安。然而，所谓的“内卷”，在根本意义上只是我们的内心在冲突、在内卷。一旦看清楚这个本质，就会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焦虑，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折腾。如此，也就从“内卷”的假相当中走出来了。所谓恰当的努力，意味着随顺生命的韵律和节奏，当为则为，当止则止，不必刻意，不必强求，更为重要的是，接受当下，安住当下，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事实上，一个人在此生当中该得到的一切，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韵律，它会如期而至，也将如期离去。所以，它会来，它会走，这是人生的常态；让它来，让它走，这是智者的心态。

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失败？在这个显性的世界，万事万物都体现为二元对立，一正一反。《易经·系辞》中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如同白天和黑夜的交替，世间的得与失、苦与乐、毁与誉、成与败，也是来回反复，交替更迭，然而，头脑的惯性是去选择：我只想要得到而不愿失去，我只想要快乐而回避痛苦，我只想要赞誉而拒绝诋毁，我只想要成功而抗拒失败，这就注定了要承受内心的煎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成功与失败，如同阴阳之关系，它们也是彼此掺杂、互相交替的，有成功就有失败，有失败也就有成功，成功的背后是失败，失败的背后是成功，正所谓祸福相依，得失相伴，唯有智者，懂得其背后的规律和法则，真正做到成功时淡然，失败时坦然，这是一个保持接受的状态。事实上，只有懂得接受失败，甚至享受那个失败的人，最终才有能力接受成功，才有能力享受那个成功。否则，失败会令一个人陷入绝境，成功也有可能让一个人陷入疯狂。古代小说中的范进中举，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智者接受成功，也接受失败。在本质上，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存在为我们量身打造的课程，它们会安排在最为恰当的时间。通过这些特殊的功课，一个人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灵品质，不断地靠近自己的本心本性。

总而言之，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仅要懂得向外追逐，获取必要的生存条件，适度累积外在的财富，也要懂得适时踏上内在的旅程，结束自己的无知，减少自己的恐惧，迎来越来越多的宁静、慈悲和喜乐。在最终意义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发生在过去，也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在未来，所有事情都是而且只能以当下的方式到来。生命只存在于当下，错过了当下，也就错过了生命，成功也只存在于当下，也就错过了成功。一个连今天都把握不住的人，一个习惯于抗拒当下的人，他如何能够把握成功，又如何能够享受成功呢？就此而言，真正的成功不在外边，而是在我们里面，真正的成功不在未来，它就在此时与此地。

书人书事

他与黎明永在

——缅怀闻黎明先生

郑干山 文/图



闻黎明先生今年1月3日的猝然去世，令我非常震惊，闻一多以及西南联大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正在需要他的大力帮助和指导时，他却突然离开了讲席与坐席，这实在是一个无可弥补的遗憾！

我拜读先生的著作，是源于外公刘声烈与西南联大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讲西南联大，除了算学系的往事外，外公也会讲到文科师生里很多趣闻，讲到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等。就这样，我读到了闻黎明先生的《闻一多多年谱长编》《闻一多传》《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等，尤其是在修编《闻一多多年谱长编》基础上修订过的《闻一多传》，应该是关于闻一多生平的最权威的著作，我以为，目前的闻一多传记作品以及诸多衍生著作，尚无出其右者。

作为闻一多先生的孙子，为祖父作传，闻黎明是怀抱着情怀的，无论于公于私，都是如此。故他的著作，不浮夸，不偏倚，是客观而平实可信的，正如他的为人。我能与闻黎明先生相识，出于偶然，2017年深秋某日，几位朋友相聚，正好约到了深入研究西南联大龙泉古镇文化的某君，他告诉我正巧，他要带一位重要朋友来参与聚会，与大家相识。坐定后，他带来的这位长者朋友正是闻黎明先生，为西南联大文化研究助力，黎明先生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来昆明了。与先生神交已久，忽然间就能面临邂逅，有点惊艳的感觉，只是聚会时，人数甚多，未能深聊，仅短暂停交，就各自别过，算是认识了。

第二年是纪念国立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6月16日，突然接到昆明市博物馆田建兄电话，约我到福照楼与客人吃饭，说有一事相商，应约去到福照楼，田建、汪宁夫妇为我介绍的客人居然是闻黎明先生夫妇。原来，黎明先生为纪念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活动准备给西南联大博物馆捐赠一件十分重要的文物，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包裹，是一套四册线装本的商务印书馆1938年九月再版（原署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再版）的《鉢印集林》（童心安收藏），书中收入的都是秦以来各朝代的各类印鉴，朱文白文，各种风格皆备，小心翻阅，感觉方寸天地，气象万千。书中铃有多处蓝色“国立西南联大图书馆”藏书章。黎明先生介绍说：当年祖父为解决抗战时期一家八口贫困生活状况，在朋友动员下，他决定发挥专长，挂牌治印以补贴家用，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等12位教授还联合署名，由浦江清教授撰写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四册《鉢印集林》就是祖父治印期间从西南联大图书馆借来的参考书，书中还夹有其阅读《集林》时有批注痕迹的小纸条。由后来祖父为争民主而遇刺身亡，这一套《鉢印集林》没来得及归还联大图书馆，几十年来就一直保存在祖父的遗物中。

黎明先生趁这次纪念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活动，准备把这一套《鉢印集林》归还给联大博物馆，他笑言这是物归原主。田建兄以为这是应该好好宣传一下的雅事，约我来是想以新闻报道一下，没想到黎明先生婉言拒绝了，他说：物归原主是理所当然的，这不值得宣传和炒作。黎明先生的态度很坚决，大家也就作罢了。后坐下来喝茶，大家谈得很投缘，关于西南联大，黎明先生的许多观点很客观，也很宽容，他说，联大师生中的诸多分歧，除了当事人个性、学养、处事风格不同外，对中西方文化的认同程度的不同，大致将师生分为了两大阵营，这是一个文化大背景，也显示着100多年来“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的争鸣之态。黎明先生说：我就是一个“黎明派”，对一切都应该采取包容、客观和期盼光明的态度，一切期望黎明，光明就会到来。他并不讳言闻一多先生身上的一些性格特点，如急躁，有时爱走极端等等，这些难免会生活在和工作中碰到障碍，但闻一多先生后来由学者成为了民主斗士，除爱国、敬业之情怀外，激烈如火

的性格也锻造了他。闻黎明先生那天兴致很高，我们又移步到他所住的宾馆继续谈了一个多小时，谈闻一多，谈李公朴，谈刘文典，也谈“一二·一”，谈云南抗战，谈他多年来治学的方向，谈他在日本的工作与生活，又谈起他已经90多高龄的父亲闻立雕，听说父亲非常怀念昆明，想念昆明的烧饵块，那天田建夫妇专门准备了饵块和酱料给他们带回北京，黎明先生说，回北京就给老父亲做烧饵块，老人一定非常高兴……我们告辞出来时，他紧握我的手说：我们第一次不算真正相识，今天才算！以后要多联系，多交流……

后来，我总是第一时间能够收到先生发来的《闻一多研究动态》，到昆明时会微信通知我，昆明举办纪念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活动时，好像黎明先生和他的父亲闻立雕先生也来了。可惜的是，总是机缘不巧，几次约定都错过了，我后来居然再没有见到先生。去年7月，我应约为昆明“西北新城”普吉主编了一本书，采访和查阅到不少关于闻一多先生在普吉的资料，我兴奋地告知黎明先生，他回信说：真好，再到昆明一定相聚畅谈。造化弄人，没想到，90多高龄的闻立雕先生去世不久，年仅71岁的黎明先生也不幸乘鹤西去，我们许多相约也成为了一个个永难实现的约定。好在“黎明”是一个嵌在他生命中永恒的字眼，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一切期望黎明，光明就会到来。闻黎明先生将与黎明永在！

云岭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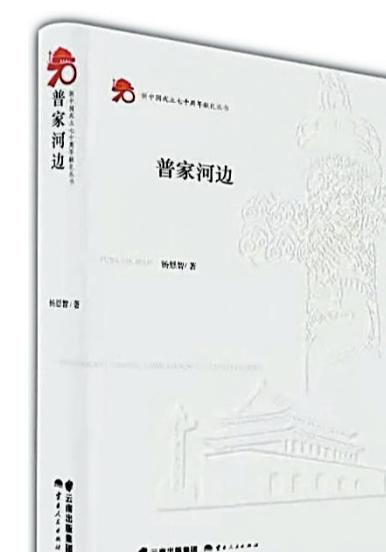
现实抒写与愿景展望

——读长篇小说《普家河边》

杜福全

扶贫题材的长篇小说《普家河边》（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版），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对深度贫困地区乌蒙山区的扶贫工作进行了深度介入和抒写，是青年作家杨恩智对自己驻村扶贫工作经历的深度挖掘和提炼。

小说以市科协派驻普家河村的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德伟驻村开展扶贫工作的工作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和所做所为为主线，普家河村的地域环境、风土人情、村情民意、人文景象……随着扶贫工作推进渐次呈现出来。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没有回避当下农村生活的种种乱象，也没有回避乡村治理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矛盾和弊病——普家河村的副支书违反“三委”人员及其家属不能纳入贫困户的政策规定，将自己的儿子纳入贫困户并申请建房补助；本是集体土地被征用的补助款，因故被列为危房改造补助项目，但真正的一些贫困群众却既没有安全住房又不能享受危房改造补助政策；村组干部长期明里暗里冒领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致使一些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保障有名无实；老卖本分因学因病致贫的人家没有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故享受不到国家扶贫政策，而好吃懒做的人却反而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工作中的各种繁复表格、数据、档案的反复收集和填报，消耗了基层工作者的大量精力和时间；普家河村的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生活用水短缺，导致外来的媳妇因为没水洗澡而丢下丈夫和孩子改嫁他乡；村组公路保通质量不高，还有不通公路的村民小组；农业产业发展滞后，还停留在靠天吃饭的状态……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德伟带领驻村扶贫队员，协同乡村干部为实现脱贫攻坚任务千方百计想办法，各尽所能，通过各种途径协调争取项目资金，为普家河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实际问题。这个过程，尽管是在为普家河村的村民办实事、办好事，却面临着诸多麻烦和阻力：一些村民的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一些村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些村民故意出难题刁难，一些村民贪小便宜，缺乏大局意识……项目的实施，工作的推进，都在挑战和考验着乡村干部和



扶贫队员的工作能力和智慧。

小说以灰色幽默和黑色幽默相互融合的叙事风格，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做基层群众工作的生动有趣场景。在这些场景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当下乡村社会衰落的种种镜像，比如，一些村民对丑恶的麻木和集体旁观……在这些镜像里，我们也看到了扶贫干部的责任和担当，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止于完成工作任务，在看似嬉笑怒骂、打诨插科和斗智斗勇的过程中，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扶贫工作者的良苦用心，展示了扶贫工作者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也让我们看到扶贫工作者对农村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正是这样一种难得能可贵的情怀，让故事中的人物有了鲜活的灵魂、鲜活的性格，有了血肉和情义，也有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从而使小说的叙述节奏变得生动活泼起来，故事的推进变得饱满、丰富起来。

作为一部扶贫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在扶贫第一现场见证并参与了这项历史性的工作，小说中对扶贫政策、扶贫措施、方法步骤和目标任务的把握，都具有明显的客观真实性，对各级各部门的扶贫工作者、扶贫工作的参

与者的工作情况和心理状态进行了现实关照和真情书写。小说的叙事语言和人物对话，具有明显地域特征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为故事的结构和展开营造出了强烈的现场感和代入感。可以这样说，《普家河边》讲述的扶贫工作，就是深度贫困地区乌蒙山区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是一部具有地域特征的扶贫工作写照，是一部特定时代背景下特定区域扶贫工作样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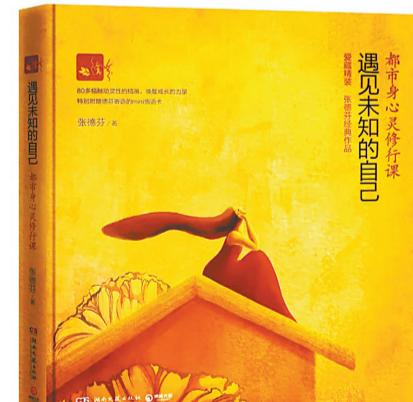
当然，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为了记录和发现社会进程中被忽略和忽视了的一面，让事物呈现出本来的样貌。正如作者在小说中写到的，普家河村的扶贫工作仅仅是做了一些面上的事情——普家河村的水、电、路通了，村民有了安全住房，产业发展有了新途径，“两不愁三保障”有了根本性保障，但这只是解决了物质贫困方面的问题。要让农村“活”起来，让乡村自身产生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关键还是在人。于是，张德伟在普家河村谋划了一个预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座谈会，邀请了普家河村所有的精英人士参加，包括普家河村在外面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外出打工的有识之士，留在普家河村的能人代表，不同层次的学生代表，村民小组长，以及市里、县里、乡里的有关领导。在这个座谈会上，要号召普家河村的人摒弃“等、要、靠”的思想，树立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将能动员的力量动员起来，让普家河村的这些人形成一种共识，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出力的出力，能出策的出策；该盘娃娃读书的，都狠命地盘娃娃读书；能带动他人致富的，都用心用情地带动起来”。

小说的结尾，座谈会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因村里独居老人侯万发的突然失踪而不了了之，这似乎暗示了普家河村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不过，作家是存在的勘探者，一部小说不可能断言任何东西，而是探询和提出问题，探寻存在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看似不了了之的结尾，实际上给普家河村的未来留下了更为广阔的展望空间。

遇见爱，遇见美好

——《遇见未知的自己》读后

林琼



焕然一新的风景，遇见更好的自己。但有的时候，我们就像颠簸于汪洋中一叶偏离了航向的孤舟，漫无目的地在浩瀚的深海里飘荡。一阵疾风骤雨后，轻则船体受损，重则船身散架，甚至面临沉船的危险。在强烈的恐惧感和自我保护欲的驱使下，我们心中蓄积良多的负能量如开闸的洪流倾泻而出，那个歇斯底里的我们，与平日里温婉随和的自己判若两人。这时，我们就要像书中主人公若菱一样，毅然抛开外界事物对情绪的影响，努力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通过多与志同道合者相处、多向心悦诚服者学习、多读开卷有益之书、多做有益身心之事等方式，转移关注重心，激发自身潜能，在寻找和感知自己内心深处真正喜悦过程中，排解忧伤，收获幸福。亲爱的，慢慢改变，相信严冬过去，就是暖春；相信每一个砥砺奋进的我们，都会品尝到喜悦的果实。

书中谈及的“和平”，表达的是一种平和的心态。痛失所爱的伤痛、劳而不获的无奈、遭受掠夺的无助，会让更多浮躁、消极、颓废的情绪不由自主地充斥我们内心，让原本平和的我们急躁、彷徨、偏执，不可理喻，甚至不可一世。这时，我们就要像书中主人公若菱一样，适时摘下角色面具，在对什么是自己的事、什么是他人的事、什么是老天爷的事的明晰、思忖、梳理和区别对待中，改变心境，舒缓情绪，更加平和理性地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更加阳光积极地迎接每一缕属于自己的希望之光。亲爱的，慢慢调适，相信泰然自若的我们，有能力、有魅力吸引到更多美好的人、事物。

亲爱的每一个我们自己，“外面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关爱内心，潜心向上，那个更好的自己，一定会如约而至；爱、喜悦、和平，一定会与我们不期而遇。